

143
2426
6(17)

56



列寧斯大林論經濟與政治

奧斯特羅維強諾夫著

時代出版社

列寧斯大林 論經濟與政治

奧斯特羅維強諾夫著

林 秀 譯

時代出版社

К. Островитянов
Ленин и Сталин
об экономике и политике
Перевод Лин Сю

版權所有

1950年1月上海初版

1953年3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800,1—23,020冊·定價2,200元

36開·83定價頁

*

時代印刷廠排版

外文印刷廠印刷

源豐裝訂所裝訂

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總經售

(一)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對經濟和政治的相互關係的主觀觀念主義的看法會佔着統治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見和觀念的基礎，就是現實的經濟利益；它是由這個或那個人在社會上的階級地位決定的，而階級關係則依據着現社會的經濟，歸根結底，就是依據着業已達到的生產力的水準。

每一種生產力的水準都適應着一定的生產關係，這種生產關係構成了現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又決定了聳立在它上面的政治、法律、和觀念等上層建築。

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二日，恩格斯在致勃洛赫的信中強調道：『歸根結蒂，實際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才是決定的因素。』（馬恩書信選，

一九四七年版第四二二頁)。但是，恩格斯說，如果從這裏得出結論，「彷彿經濟因素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同前)，則是完全不對的。

在基礎——即經濟——和上層建築之間，特別是和政治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結底，「經濟的運動，是通過無窮盡的偶然而給自己開闢道路的」(同前)。

發生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意識的上層建築，在自己進一步的運動和發展中，在它們一般地依附經濟基礎的範圍內，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政治、法律、思想意識這些上層建築的這一相對獨立性，在下面幾點中表現出來：第一，在一般地依附於經濟基礎的範圍內，它們在自己的運動中服從着本身的內在規律；第二，它們從自己的前身承受了一定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意識的遺產，這些東西是它們發展的出發點，並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這一發展；第三，它們對經濟基礎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反作用。

各種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關係是不完全一樣的。經濟基礎與政治、法律這兩種上層建築間的關係比較密切。它和意識形態如宗教、哲學的關係則比較疏遠，而經濟多半是間接地，通過政治、道德、法律，即最後才對哲學發生一定的影響。恩格斯在給 K·施米特的信中討論經濟對哲學的影響時寫道：「經濟的發展，最後也對這些領域佔着優勢，對於我，這是不容爭辯的。但是這種優勢祇在某一領域本身所限定的條件範圍之內：例如在哲學中，是限定於經濟的影響（這些影響大部份仍舊祇在自己的政治等的外衣中發生作用）對前人所收集的現存哲學材料的作用。經濟在這裏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它只是為當前所有的思想材料確定了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形式，但即使這一點，它多半也是以間接的方式，而對哲學產生最重要的直接作用的，則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反映。」（同前，第四三〇頁）。

信末，恩格斯得出下面的結論道：「因此，如果巴爾特武斷我們不承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反映對

這一運動本身所產生的反影響，那他祇是在同風車作戰而已……如果政治權力對經濟是無能為力的，那我們為什麼要爭取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呢？暴力（即國家權力）——這也是經濟力量呀！」（同前）。

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國家的政策怎樣能影響經濟的發展呢？恩格斯回答這個問題道：「國家政權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能向着同一方向運動，——這時，事情就能加速進行；它可能向着經濟發展的相反方向運動——如果這樣，目前每個大民族的國家政權，經過一定時期就要崩潰；或者它可能阻止經濟向一定的方向發展，而把它推向別的方向。這種場合結果也總不出前二種情形。但顯然，在第二種和第三種場合，政治權力會使經濟發展受到莫大的損害，可能引起人力物力的大量損失。」（同前，四二七——四二八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這樣解決了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作用的問題。

(二)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與政治學說，在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更高的發展。

列寧的偉大功績首先在於，他澈底粉碎了修正主義者歪曲馬恩關於經濟和政治學說的企圖。恩格斯還在給勃洛赫的信中就批評了若干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有時『過份重視了經濟方面的意義』（同前，四二四頁）。

這一批評對第二國際的領袖也是完全適用的。

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歪曲了馬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的學說，同時否認思想和政治制度在社會發展和革命運動中的作用。由此出現了考茨基的『生產力理論』，他說社會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被動的產物。根據這一『理論』，考茨基

和第二國際的其他「理論家們」得出結論道：社會主義革命祇在生產力水準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有可能，俄國還沒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

這一「理論」，在右翼社會黨的手中成了反對蘇聯、反對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主義運動的反革命武器，

列寧證明，俄國的經濟和文化雖然落後，但她具備了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主觀和客觀的先決條件。同時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關鍵，它的政治形式就是蘇維埃政權。

在批判孟什維克蘇哈諾夫的「論我們的革命」一文中，列寧寫道：「如果爲了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準（雖然沒有人能夠說出這一定的「文化水準」是怎樣的），那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先用革命方法爲這一水準爭取先決條件，隨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急起直追趕上別國人民呢？」（列寧全集二十七卷四〇〇頁）。

這樣，無產階級的奪取政權，列寧認為是消滅

俄國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必要前提。從問題的這種提法，可以知道，政治可以獨立運動，它是根本改造經濟並進而大大地加速經濟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和第二國際的歪曲宣傳家完全相反，列寧全力強調了政治對經濟的積極作用。

列寧發展了馬恩關於經濟是最後決定政治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這一論點。這在列寧所作的定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中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列寧的這一論點在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關於職工會的決議中得到了最完整的發展，那裏面說：『政治是經濟底最集中的表現，是它的綜合和完成。』

這裏首先強調了經濟對政治的一定作用。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它的綜合。另一方面，也着重說明了政治對經濟的積極作用，因為政治不單是經濟發展趨勢的綜合，而是這些趨勢的完成。

列寧關於研究社會和經濟的現象與過程時把政治立場提到第一位的論點，是他對馬列主義的經濟政治學說的一個寶貴貢獻。

列寧揭露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對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職工會的作用問題的反布爾什維克立場，他寫道：『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我再說一遍，因為先前我已聽到過這種與什麼都不相符的，出之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口是不能容忍的責備我的「政治」立場的話。政治不能不先於經濟。發表別種論調，就是忘掉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列寧全集二十六卷一二六頁）。

有些經濟學者從這裏得出結論，以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條件下，關於經濟是決定着與它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築的基礎，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法則已不適用了。

是否可以從上述列寧的話得出這樣的結論，以為他說的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和作為基礎的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不，不可以的。

這裏並不是說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先於那作為基礎的經濟，這是很清楚的，第一，列寧在這篇文章中痛斥布哈林所唱的生產民主的論調，而強調了生產關係（即經濟對政治的關係）的決定作用。列

寧對這個問題說道：「任何民主制度，正如一切政治的上層建築一樣……最後都是爲生產服務的，是由當時社會的生產關係決定的。」（列寧全集二十六卷一二四頁）。

第二，列寧在提出政治先於經濟的論點時，重新提起「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句話，那裏面就包括有經濟是基礎，決定着政治的上層建築這一觀念了。

列寧所謂政治先於經濟，指的是：一般地對於職工會工作，特別對於職工會在蘇聯經濟領域中的任務，政治立場是首要的。

列寧認爲工人階級的政治任務位於經濟任務之前，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這一點，列寧早在和那些把無產階級的任務歸結於爭取日常利益的經濟鬥爭的「經濟派」論戰時就指出了。

「從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論調，決不能得出經濟的（即職工會的）鬥爭具有最重要意義的結論，因爲最基本的、「決定性的」階級利益，一般地祇有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加以滿足；特別是無產

階級的基本的經濟利益，祇有依靠政治革命，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才有滿足的可能。」（列寧全集第五卷三六二頁附註）。

大家都知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不能根本改變工人階級的地位，不能防止使無產階級相對和絕對貧窮化的資本主義法則的作用。工人反抗資本家的經濟鬥爭，目的是使工資接近勞動力的價值，照例，由於存在着大批失業後備軍，以及資本主義累積的普遍法則起着作用的緣故，工資遠遠地落在勞動力的價值之後。恩格斯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力法則非但不被職工會的鬥爭破壞，倒是由其實現了。與此相反，工人階級政治鬥爭的任務則是要推翻資本主義，樹立無產階級的專政，反映了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經濟發展已趨成熟的要求。

這樣，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基本利益祇有靠政治鬥爭才能得到滿足，職工會的經濟鬥爭所能得到的只是而且祇能是部份地，日常生活上的一些暫時利益。

由此可見，工人階級的政治任務和他們基本的經濟利益是完全符合的，——這種利益表現在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建立足以保證不斷提高勞動者物質和文化水準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另一方面，可以明瞭，當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鬥爭時提出的日常生活中暫時的經濟利益，是從屬於他們的政治利益的。

列寧的這些意見，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右翼社會黨，用盡手段，拚命轉移工人羣衆的目光，使他們脫離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

抱着這一目的，右翼社會黨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發動了譏謗運動，一面却竭力把目前的資本主義英國描繪成為特別好的、又「民主」、又「社會主義」的國家，拚命支持反動集團的反共行動，贊成禁止政治性的和經濟性的罷工，擁護「凍結」並削減本來已經菲薄可憐的勞動者工資的政策。

列寧曾批判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者，斥責

他們是「資本家的看門狗」、『工人運動的盜賊』。

這一批判，對於爲了獨佔資本家的利益而犧牲工人階級利益的現代右翼社會黨人也是完全適用的。

列寧關於政治領導經濟的學說包含着考慮經濟措施必須站在政治立場上的意思，就是說，經濟措施必須從國內階級對比的觀點，首先從工農聯盟而由工人階級領導的觀點來加以研究。

托洛茨基派的經濟政策，則是以拆散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破壞工人階級的專政，損毀革命的經濟果實爲目的的。

在關於職工會的辯論上，托派提出了職工會立刻「政權化」的口號；所謂「工人」反對派的集團，在這辯論中，替主張『職工會是工人階級最高的組織形式』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反黨立場辯護，把職工會跟黨和蘇維埃國家對立起來；『民主集中派』則拼命攻擊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布哈林抬出所謂緩衝綱領，掩護、支持了最險惡的敵人——托派份子。其實，正如俄國共產黨

(布)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的決議中所指出的，當時所爭論的是『對反對軍事共產主義的農民的態度，對非黨工人羣衆的態度，當內戰告終時，黨一般地對羣衆的態度。』

和上述托洛茨基、布哈林，『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之流反黨反革命的立場相反，列寧及其擁護者堅持了職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學習政治和經濟管理的學校這一觀念，提出了職工會用說服方法去建設自己工作的要求，因為祇有這種方法才能吸引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各式反對派的政策，都是要和工人階級脫離關係，削弱黨和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結果，必然會使無產階級專政垮台，蘇聯的經濟成就歸於烏有，便利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復活。

因此列寧在『再論職工會』一文中寫道：『政治的立場，這意思就是：如果對職工會看法不正確，就要毀滅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對事沒有正確的政治立場，無產階級就不能保持自己的

統治權，當然也就不能解決自己的生產任務了。」

（列寧全集二十六卷一二六頁）。

研究經濟措施、經濟活動，最要緊站穩政治立場，這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毫不抵觸。

如果政策是正確的，那末在政治立場上研究經濟措施的意思，就是要從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利益的觀點，從經濟發展中新的已趨成熟的要求和進步趨勢——這些要求和趨勢集中表現在政治中——的觀點來處事。

列寧關於研究經濟現象和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措施必須站在政治立場上的指示，在起初為排擠和限制、隨後為完全消滅資本主義因素而鬥爭的時期起了莫大的作用。

在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黨不屈不撓推行了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工農聯盟的政策，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社會主義死敵企圖拆散工農聯盟的一切陰謀。

黨粉碎了托派所唱的社會主義的原始累積「理